

论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记忆书写

吴玲英, 郭龙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石黑一雄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承袭了其前几部小说对个体如何面对伤痛记忆所展开的探讨, 并进一步创新性地书写了集体的记忆和遗忘。首先, 就个体记忆书写而言, 该小说呈现出典型的悖论性特征, 作者运用第三人称转换内聚焦的方式书写了埃克索夫妇对“是否恢复个体记忆”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其次, 就集体记忆书写而言, 小说通过书写不列颠和撒克逊两个民族间的集体屠杀记忆, 隐喻了后现代语境下集体记忆被政治话语所挪用和操纵从而引发新一轮暴力的潜在风险。通过书写“记忆”, 包括个体在创伤记忆下如何与自我达成和解、战争双方如何直面曾经的集体屠杀记忆、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等, 石黑一雄向读者展示了记忆与遗忘这对命题的两难之境, 旨在启发读者思考超越记忆与遗忘的二元对立, 以及构建遗忘基础上记忆的可能。

关键词: 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记忆书写;记忆;遗忘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0)02-0151-08



从《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3)到《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一直致力于探讨个体如何面对伤痛记忆、如何与曾经的自我达成和解等话题, 因此可以说, “记忆”是贯穿石黑一雄创作的核心主题, 其2015年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 以下简称《巨人》)亦不例外。在延续以往对个体记忆探讨的基础上, 该小说对“社会集体如何记忆或遗忘其历史, 特别是历史中黑暗的一面”^[1]进行了书写。小说将场景设置在公元6世纪的英格兰, 亚瑟王死后, 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比邻而居。然而, 此时一场迷雾笼罩着这片土地, 所有人都因为迷雾而失去了记忆。年迈的埃克索(Axl)和比阿特丽丝(Beatrice)^①夫妇决定在记忆尚未完全丧失前, 踏上一场寻子之旅。路途中, 埃克索夫妇遇到了撒克逊武士维斯坦(Wistan)、男孩埃德温(Edwin)和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高文(Gawain)。原来, 笼罩这片土地的迷雾是母龙魁瑞格(Querig)的气息所致。母龙是以亚瑟王为首的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实施血腥屠杀之后, 为实现永久和平的目的而刻意安排的。维斯坦此行的目的就是屠杀母龙, 帮助族人恢复屠杀记忆。而作为亚瑟王的骑士的高文肩负着保护母龙的义务。

至此, 一场关于“是否屠杀母龙以恢复记忆”的较量悄然展开。

目前, 国外学界关于该小说的研究集中于关注石黑一雄在文类上的突破, 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界定奇幻文学的讨论。例如, 赫兰德(Tom Holland)认为, 石黑一雄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惊人而大胆的文类改变”, 从而“冒险进入了托尔金的领域”^[2]。巴特斯比(Eileen Battersby)则认为, 该小说的叙事有童话文学的色彩, 对旅程的聚焦又使其具有流浪文学的特征, 文中大量的暗指显示其文学小说的身份, 高文骑士的出现亦使其具备中世纪浪漫文学的烙印。如此一来, 该小说“既不是童话也不是奇幻故事, 而只是无法令人信服地徘徊在二者之间”^[3]。其他的一些评论者在该作品进行界定时还运用了探险、寓言等术语。霍德森(Richard Hodson)梳理了与该小说相关的十八篇书评后发现, 并不存在清晰的奇幻文学之界定标准^{[4][61]}。上述争论印证了石黑一雄自创作这部小说以来的担心: 读者可能会因为过分关注小说的奇幻色彩, 从而忽略他透过这一文体形式想探讨的个体和集体记忆问题。相比较而言, 国外学界对小说中“记忆”的研究显得单薄, 其中主要有: 查尔伍德(Catherine

收稿日期: 2019-07-04; 修回日期: 2019-12-20

作者简介: 吴玲英(1967—), 女, 湖南慈利人, 文学博士,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郭龙(1987—), 男, 河南三门峡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联系邮箱: guolong206@163.com

Charlwood)运用心理分析中对记忆的研究探讨了小说中的遗忘;弗农(Matthew Vernon)通过研究该小说对《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1967)的借用来探讨不列颠身份的形成。

国内的研究恰好相反,仅有个别学者研究了该小说的形式。如,刘倩对小说中的骑士文学元素进行研究,认为石黑一雄戏仿了《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以此来达到其反讽意图。国内的学者大多从内容、主题方面展开研究,尤其随着石黑一雄斩获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该小说的研究日趋增加。主要的研究视角包括:小说中所采取的中性写实的叙事手法、历史隐喻与书写、悬念“景观”以及他者的瓦解与建构等。当然,也有学者关注到小说中的记忆,如,束少军和李丹玲在对该小说进行评介时共同关注了小说的记忆主题;邓颖玲和陈婷婷分别探讨了小说的遗忘叙事和大屠杀记忆;郑佰青则聚焦了小说中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记忆从某一侧面展开,而并未就“作者如何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呈现记忆和遗忘之间的矛盾、引导读者思考如何超越这一矛盾”等问题展开论述。

因此,本文拟探究石黑一雄如何通过埃克索夫妇对个体身份记忆的追寻,以及不列颠和撒克逊民族对待集体屠杀记忆的不同态度,来强调记忆和遗忘这对命题的两难,并进一步启发读者思考如何超越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巨人》中石黑一雄在当代历史语境下以隐喻的方式书写了潜藏在人类意识深处的记忆与遗忘,小说彰显了作者在持续关注和深刻反思个体如何修复创伤记忆、集体如何处理屠杀双方关系、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等人类命题,并探寻了超越记忆与遗忘的二元对立、构建遗忘基础上记忆的可能。

一、伦理身份危机中个体记忆的悖论性书写

“记忆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是过去经验在大脑中的记录,并代表着对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5](88)}记忆是个体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因此,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个体身份的坐标。小说中,迷雾笼罩下的不列颠村落的村民们几乎都丧失了记忆。尽管如此,埃克索夫妇脑中尚残存一丝关于儿子的记忆,正是这一碎片化的记忆提醒着埃克索夫妇作为父母的伦理身份危机。他们只是隐约记得,他们有个儿子,但孩子是谁、长什么样、为什么离家等记忆在他们的脑海中已经很难厘清。为了尽快确认他们作为父母的身份,埃克索夫妇不止一次就“出门

寻子”话题进行交谈,可是由于某些原因,“一提起这个话题,两人就有一种奇怪、不舒服的感觉”^{[6](18)}。儿子的离家出走以及在他们记忆中的缺失解构着他们的父母身份,这一危机使埃克索夫妇迫切地踏上一场寻子之旅。然而,寻子之旅揭开的还有他们作为彼此爱人的身份危机。摆渡的船夫问及他们夫妻间最珍贵的记忆,这无疑相当于拷问埃克索和比阿特丽丝之间的爱情。由于迷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很少能对往昔有清晰的记忆,可是如果记不住他们共享的过去,她和丈夫就无法证明彼此相爱,船夫就会将二人分离。船夫暗指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 2007)第六卷中阿刻隆河畔(Acheron)撑船超度亡魂的艄公卡隆(Charon)。无数亡魂请求渡河,但卡隆却只渡那些肉身得到安息的亡魂过河,以证明他们是有爱的灵魂。这与石黑一雄对夫妻间爱与记忆的关系及这种记忆能否超越死亡思考不谋而合^{[7](109)}。从这一意义上讲,埃克索夫妇的记忆追寻之旅尤为重要,不仅能让他们钩沉关于儿子的记忆,从而重新确立他们作为父母的伦理身份,而且能让他们找回二人间曾经的美好记忆,否则夫妻之爱将枯竭。

然而,踏上旅途之后,埃克索夫妇对找寻记忆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撒克逊村庄里发生的一切揭开了这场遗忘迷雾的真正原因,随着真相被揭开,埃克索与比阿特丽丝对“是否应该恢复个体记忆”的态度迥异。得知母龙是夺去人们记忆的罪魁祸首之后,比阿特丽丝十分激动,“埃克索,你听到了吗?迷雾是那条母龙造成的!只要有人能杀掉它,那我们的记忆就可以恢复啦!埃克索,你怎么这么安静呢?”^{[6](154)}在比阿特丽丝看来,杀掉母龙不仅能使他们恢复关于儿子的记忆,找到儿子并和儿子团聚,从而确立作为父母的伦理身份,而且能帮他们找回彼此之间最珍贵的记忆,确认他们忠诚于彼此的爱人身份。埃克索则对此表现得心不在焉,似乎有难言之隐,“当时某种强烈而奇怪的情感在他胸中翻腾,几乎让他如临梦境……当时他有一种恐惧感,与此同时却又深感好奇——或者是种比好奇更强烈、更阴暗的感觉”^{[6](156)}。这里的奇怪反应与之前维斯坦询问高文骑士是否认识他时埃克索所表现的紧张,似乎都暗示着他难以言说和无法面对的过往。事实上,埃克索曾作为一名亚瑟王的士兵见证了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的屠杀,却未能阻止。他和比阿特丽丝之间的感情也并非如他们所表现的那样相亲相爱,他们曾经背叛彼此,并多次发生争吵,以至于儿子愤然离家出走,最终死于一场瘟疫。因此,尽管埃克索渴望通过恢复记忆来重建自己作为父亲、丈夫以及村落成员的伦理身份,但是,预感到

遗忘带来的平静可能打破后,他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怀疑和担忧。因为迷雾一旦消退,过往的伤痛或黑暗也将伴随着昔日美好的记忆一同复现,从而给两人的感情带来危机,一如埃克索向比阿特丽丝央求的那样,“如果记忆恢复,你发现我曾经让你多次失望。或者你想起我做过不好的事情,再来看我,看到的已经不是现在你眼中的这同一个人了。那么,请你至少答应我。请你答应我,公主,你不会忘记这一刻你心里对我的感情”^{[6](263)}。同样,比阿特丽丝对于即将恢复记忆也并非没有担心,“来吧,埃克索,抓住我的手,帮助我不要泄气……最担心迷雾消散的应该是我……我曾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你看看,你握的这只手都在颤抖!到时候你会对我说什么呢?你会不会转身就走,把我丢在这荒山上?”^{[6](289)}显然,埃克索夫妇在追寻个体记忆的旅程中,对“是否要恢复记忆”表现出明显的矛盾。

埃克索夫妇面临的矛盾回应了石黑一雄先前小说的议题之一,即个体如何面对过去的伤痛记忆、如何与曾经的自我和解。个体在处理过往的伤痛时会采取“自我防御机制”^{[8](24)},即本能地选择逃避、竭力去压制甚至遗忘不愉快的回忆,只留下美好的记忆。但遗忘并不意味着不愉快的记忆就此消失,而只是被暂时压制在意识深处,以记忆痕迹的形式不断涌现。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将这种遗忘称为“可逆的遗忘”^{[9](12)}。小说中,埃克索虽然被遗忘的迷雾笼罩,但他的记忆尚未完全消失,他所能记起的比妻子还多,因此每当比阿特丽丝提议出门寻找儿子,他都犹豫不决。不仅如此,在寻子途中遭到高文骑士和维斯坦武士对他身份的怀疑时,埃克索闪烁其词,并对屠杀母龙表现出迟疑。显然,这表明除了母龙所导致的遗忘之外,埃克索对于过往的个人记忆采取了刻意遗忘的态度,试图以此来掩盖他与妻子之间曾经的不愉快和未能阻止对撒克逊人屠杀的黑暗历史。然而,埃克索的遗忘并没有真正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安慰,甚至到头来解构了他作为“勇敢的强者和忠诚的丈夫”的身份。往日与妻子争吵的模糊记忆片段不断涌现,提醒他曾遭遇的感情危机,寻子途中随处可见的昔日的屠杀痕迹似乎也在提示着他过去的失败和无能。埃克索内心的焦虑恰如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中那个曾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画家小野增二(Masuji Ono)的感受。日本战败后,小野增二曾一度深陷自我愧疚之中不能自拔。面对过往的记忆,作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小野增二刻意选择避开那些可能给他造成痛苦的回忆,突出和放大自己曾经的荣誉。然而,这种选择性的回忆并未减

轻他的痛苦,相反,读者透过叙事看到的是一个深陷愧疚与焦虑的画家形象。最终不堪重负的小野增二还是选择审视自己的过去,公开承认战时所犯的错误,与自我和解。由此可见,面对过往的伤痛记忆,刻意的遗忘并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但如果选择铭记一切,则会给当事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难以想象一个不遗忘的人将如何生活^{[10](15)}。记忆和遗忘看似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因为遗忘挑战着记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但又如利科所言,记忆与遗忘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11](558)}。这种平衡状态便是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遗忘。个体只有勇于正视曾经的错误或失败,并通过“哀悼”(mourning)的方式,才能与过去的自我达成和解,从而走向新的生活。“哀悼”这一概念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中提出。在弗洛伊德看来,哀悼与抑郁二者都源于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造成这种失落的既可以是具体的人或物,也可以是一种精神上的挫败。不同的是,哀悼能够使个体“迅速将力比多投射到新的对象上,以此抚平失去力比多客体所带来的苦痛”^{[12](82)},而抑郁则不然,它表明个体始终无法使自我从过去的失落中脱离出来,“只能沉溺在哀怨凝固的封闭泥淖中无法自拔”^{[12](82)}。显然,“哀悼”本质上就是个体在正视创伤记忆基础上主动选择的遗忘,而通过“哀悼”,个体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自己从创伤记忆中抽离出来,并开始将注意力向其他方向转移。遗忘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它能够将主体从创伤记忆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创伤愈合提供机会。

在此前的小说中,石黑一雄巧妙地利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方便主人公在叙述时选择回避伤痛的记忆,从而给读者留下表面上丝毫不为过去所困的印象。然而,第一人称叙述内在固有的不可靠性却又将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和痛苦展现得一览无余。最终,饱受痛苦记忆痕迹困扰的他们不得不选择正视过去的过错或失落,接受曾经的自我,并学会适当遗忘,慢慢地告别那段灰暗的历史,从而开始新的生活。而在《巨人》中,石黑一雄一反以往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采用第三人称转换式内聚焦的方式,通过设计叙述者在保持客观中立的同时聚焦不同人物的内心,“使故事的叙述声音无限接近(却又不同于)第一人称回顾性经验叙述”^{[13](77)},由此取得不亚于第一人称叙述的效果。通过再现埃克索内心的犹豫、挣扎和焦虑以及他与比阿特丽丝对“是否恢复记忆”的复杂态度,石黑一雄生动地向读者呈现了埃克索夫妇在追寻个体记忆过程

中的矛盾,同时也完成了伦理身份危机下个体记忆的悖论性书写。

二、战争创伤下集体屠杀记忆的政治隐喻书写

谈及《巨人》的创作初衷,石黑一雄曾说,他想探询“社会和国家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7](105)},而促使他触及这一话题的原因则是南斯拉夫解体、卢旺达屠杀以及法国在二战后的经历等历史事件。但他又无意将小说限定于某一具体事件,于是便以奇幻文学元素为外衣,借用英吉利民族形成过程中一段模糊的历史,从而赋予其小说更高的普适性,既能指涉历史,又能喻指当下。表面上,小说中的集体记忆书写围绕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就“是应该屠杀母龙、还是继续这场迷雾”而展开,但实质上则是围绕如何处理大屠杀的集体记忆这一议题而展开。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对以维斯坦武士为代表的屠龙派和以高文骑士为代表的护龙派之间的冲突进行书写,透过两种对待集体屠杀记忆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巨人》对集体记忆政治的隐喻。由于叙事行为的选择性特质(selective nature),人们在叙述过往的事件时便不可避免地“使记忆的意识形态化成为可能”^{[11](599)}。而此时遗忘也悄然参与到这个进程之中,通过删减、改变重点或行动轮廓、主角再塑造等遗忘策略,使故事能够别样地被讲述^{[10](599)}。

在小说中,集体性遗忘的发生与其说是集体记忆受到了操控,不如说是受到了压制,集体性遗忘共同存在于不列颠族和撒克逊族之间。多年前,不列颠的伟大统治者亚瑟王在对撒克逊的战争期间曾许下承诺“不伤害他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6](215)},埃克索曾负责这一“无辜者保护法”^{[6](217)}的实施,并被当地的村民誉为“和平骑士”^{[6](215)}。然而,亚瑟王后来违背这一法令,对撒克逊人实施了惨绝的屠杀,并利用魔术师梅林在母龙的气息里种下魔咒,使其气息中产生的迷雾笼罩这片大地,以此令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忘记民族间的仇恨,尤其使撒克逊人忘却创伤性的屠杀记忆,从而达到维护永久和平的目的。不难看出,亚瑟王所施予双方民族的遗忘是一种受到官方力量操纵的强制性遗忘,其目的是为了忘却屠杀,实现“持久的和平”^{[6](216)},一如多年暗中喂养并保护母龙的高文骑士所言,“如果没有这条母龙的气息,和平会来吗?先生,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老仇敌变成了兄弟,每个村都是”^{[6](293)}。然而,屠杀的创伤记忆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撒克逊武士维斯坦生来便有抵抗奇怪魔咒的

天赋,不仅没有忘却历史上本民族所遭受的屠杀,还肩负着寻找并杀死母龙的任务,为远在东方沼泽之中的国王的未来统治做准备。显然,撒克逊国王也在有意操纵曾经的屠杀记忆,他以维斯坦武士的仇恨为抓手来屠杀母龙,进而唤醒本族人的屠杀记忆,向不列颠人复仇,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统治。可以说,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有意并置两种处理屠杀记忆的不同方式,从而启发读者思考如何处理大屠杀记忆这一议题,这两种方式本质上反映了作者在小说中对记忆与遗忘的政治隐喻书写。

集体记忆最主要的危险在于“权威的、被强加的、被庆祝的、被纪念的历史,也就是官方操纵的历史”^{[11](599)}。《巨人》中亚瑟王在完成对撒克逊民族的屠杀后,不仅利用母龙的气息制造迷雾,以此来强制性地使双方民族忘却屠杀记忆,而且还通过高文骑士编制了一套叙事标准:对撒克逊人的屠杀和笼罩着的迷雾是亚瑟王所施行的“伟大事业”^{[6](266)},旨在永久地结束战争。否则,一旦约定遭到破坏,那么双方民族将再次陷入相互屠杀的战争,“以前我们为土地、为上帝而战,现在我们要作战,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而那些本身也是在复仇之中被杀害的。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婴儿长成大人,只知道年年打仗”^{[6](280)}。这套叙事标准不仅会剥夺受害者叙述自己的原始能力,而且最终会导致遗忘的发生,正如小说中叙述者在第十五章中的叙述,“你们有些人会有隆重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记住你们受的罪。有些人只会有粗糙的木头十字架或者彩色石块,其他的人呢,就只能藏匿在历史的阴影中”^{[6](273)}。作为屠杀的受害者或见证者,多数普通人被剥夺言说权利或能力,最终被淹没在历史阴暗的角落。然而在利科看来,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共谋,这种遗忘就不会发生^{[11](599)}。小说中集体遗忘的发生固然离不开亚瑟王的一纸命令,但是,集体对待创伤记忆的回避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构成了遗忘发生的隐秘同谋,它是“遗忘的一个既主动又被动的暧昧形式”^{[11](600)}。从主动意义上来说,修道院里以院长为代表的僧侣们的做法受到了不愿去面对真相的无知意志的驱使,他们选择轮流到笼子中让野鸟啄食身体,希望能够补偿国家所犯下的罪恶,并妄想以此来求得上帝的宽恕。然而,隐藏在表面忏悔之下的却是他们希望“继续保护恶龙,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14](5)}的真实意图。虽然乔纳斯神父和弟子尼尼安早已认识到这样做无异于自欺欺人,但是面对修道院里新一代主张埋葬过去、选择遗忘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的乔纳斯神父对此也无能为力。作者在小说中有意隐去修道院的背景,尤其是有

意隐去修道院内僧侣的身份,读者只能通过维斯坦的话语了解这里曾经是撒克逊人的要塞,后来在战争中被不列颠人所攻破。这一细节值得玩味,它暗示读者,在大屠杀之后,半主动性的遗忘何以隐秘地参与官方叙事话语,从而成为官方历史叙述的共谋。

然而,被边缘化的屠杀记忆叙述却往往能在官方遗忘叙事话语的裂缝之间找到生存的空间,并在那里执拗地言说着自身。换言之,在集体遗忘的表象之下,还存在着一种“保存的遗忘”^{[11](592)},正是这种遗忘使记忆成为可能。小说中被边缘化的普通叙述者和到处存在的屠杀遗迹无不在控诉和解构着官方的遗忘叙事。比阿特丽丝遇到的身披黑色斗篷的撒克逊妇女和在船夫面前杀掉兔子的老妇人,都因为无法记住与丈夫共享的过去而被迫与丈夫分离。她们的个体记忆虽然被官方叙事所抹杀,但她们的存在本身和对自我处境的言说却对官方叙事构成了威胁。同样,寻子途中见到的破败宅子和废墟、曾经是撒克逊要塞的修道院、隧道中遍布的头骨等屠杀遗迹也作为外在的记忆痕迹,刺激并召唤着埃克索等人被压制在意识深处的记忆,从而令他们对当前的叙事话语进行反思。一般来说,对于记忆痕迹的阅读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终极遗忘的倾向,它是由于痕迹的消失而产生的遗忘;一种是可逆的遗忘或是难以遗忘的倾向。我们对于遗忘的矛盾情绪正是在这两条关于深度遗忘的异质性路线之间展开的^{[11](562)}。在前一种倾向中,出于想要极力摆脱某种记忆的意图,我们通过对客观知识的占有去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叙事话语,或是刻意去清除产生这种记忆的外在质料,但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蜡块印记隐喻一样,这种破除记忆外在质料的行动终究会留下痕迹。而后一种倾向则产生于我们在接受外界痕迹碎片刺激后对被压制于无意识深处的情感记忆的体认过程中。因此,《巨人》中集体记忆的政治隐喻就在以亚瑟王为首的遗忘的力量和以维斯坦为首的唤醒遗忘记忆的力量之间展开。通过这一隐喻,石黑一雄不仅揭露了“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之间相互强化的内在机制”^{[15](25)},而且引出了遗忘与记忆这对看似二元对立的概念之间存在的种种联系,正是保留的遗忘或可逆的遗忘为记忆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从本质上来说,石黑一雄对大屠杀后集体记忆政治的隐喻性书写仍然是围绕记忆与遗忘这一复杂命题展开的。面对集体的大屠杀记忆,以维斯坦为首的屠龙派坚持要找回失去的记忆,为在战争中逝去的同胞复仇;而以高文骑士为代表的护龙派却极力想要维护当下的和平局面,力图让奄奄一息的母龙完成它的使命后再寿终正寝。对于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石

黑一雄在小说中分别进行了抽丝剥茧的书写,而读者也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两种态度所分别暗含的危险之处。首先,在战后初期,遗忘常被视为带着积极的含义,它表明双方愿意搁置仇恨,面向未来,而随着公共话语范式的转变,遗忘又被认为与否认和掩盖历史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其次,简单的记忆恢复并不能够修复双方民族之间的关系,正如石黑一雄在小说结尾处所暗示的那样,伴随着记忆的恢复,新一轮的战争和屠杀将再次被掀起,“到那时候,我们之间的友好纽带,就会像小女孩用细细的花茎打的结一样,脆弱不堪。人们会在夜间烧掉邻居的房子……这儿会成为一块全新的土地,撒克逊人的土地,没有痕迹表明你们曾在这儿生活过”^{[6](306)}。显然,在石黑一雄看来,上述两种态度都不是对待历史记忆的最佳态度,而透过撒克逊男孩埃德温最后的思索,石黑一雄或许在向读者暗示:在处理屠杀双方民族关系时,建立在原谅而非仇恨基础上的铭记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面对曾经的极端暴力,铭记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固守过去,与仇恨、报复和分裂等负面含义密切相关”。相反,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对历史暴力的记忆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治疗作用的伦理责任”^{[16](32)},它更多体现的是对受害者及其亲属的尊重和对历史的承认。应该看到,这种记忆中也包含着遗忘的因素。它是由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共同参与的遗忘,双方只有主动卸下过去的负担和仇恨,并铭记历史的教训才能够真正走出暴力历史的阴霾,重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如此,石黑一雄借用不列颠和撒克逊这段历史来书写集体记忆和遗忘,还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不列颠和撒克逊两个民族由相互征伐到比邻而居,最终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当代英国的民族基础,而且作为文化符码的亚瑟王和高文骑士也早已镌刻在当代英国人民共同的民族记忆之中,由此,作者提供了超越简单民族对立的可能。同时,比阿特丽丝与但丁《神曲》中带领旅人但丁游历天堂的向导同名,这表明埃克索夫妇找寻记忆的旅程也是对记忆和遗忘这对命题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最终也将超越二者的简单对立,达到最高的境界。

三、遗忘基础上的记忆:超越记忆与遗忘的二元对立

自古以来,记忆与遗忘被视为一种相互对立的存在。其中,记忆备受中西哲学家和思想家青睐。希腊诗人荷马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

依靠强大的记忆力才创作而成。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肯定了良好的记忆力对哲学家的重要性,并将遗忘看作是威胁记忆的存在而加以否定,在其著名的“回忆说”(Theory of Recollection)中更是将记忆看作是进入理念世界的重要媒介^{[17](114)}。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将记忆看作是通向上帝真理的渠道,“主啊!我走遍了记忆的天涯地角找寻你,在记忆之外没有找到你。从我知道要认识你时开始,凡我找到有关你的东西,都不出乎我的记忆的范围,因为从那时起,我从未忘掉你”^{[18](208)}。在论述记忆时,奥古斯丁也提到了遗忘,“但遗忘是什么?只是缺乏记忆。既然遗忘,便不能记忆,那么遗忘怎会在我心中使我能想见它呢?我们凭记忆来记住事物,如果我们不记住遗忘,那么听到遗忘二字,便不能知道二字的意义,因此记忆记着遗忘”^{[18](199-200)}。显然,奥古斯丁注意到,遗忘的存在依赖于记忆作为前提,但他紧接着又提出,“遗忘并非亲身,而以它的影像存在记忆中,如果亲自出场,则不是使记忆记住,而是使记忆忘记!”^{[18](200)}虽然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记忆和遗忘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虔诚的基督徒身份要求他要始终铭记上帝和真理,拒绝遗忘,因此他对于遗忘的论述本质上依然是将其作为威胁记忆的存在来看待。到19世纪末,尼采一反“重记忆而轻遗忘”的哲学传统,将遗忘置于记忆之上来看待。在尼采看来,记忆并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从感性经验层面的如实记录和反映,而是经过了人类理性对它的加工和归类。所以,记忆一开始就暗含了理性化的成分,这种理性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非理性成分的压制。尼采正是将遗忘作为打破理性的束缚实现非理性的重要突破口。从此,记忆与遗忘这一对命题间二元对立的界限被打破,二者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哲学、历史和文学作品书写的重点。

《巨人》中石黑一雄对以埃克索夫妇为代表的人物记忆追寻的书写,展现了个体记忆与遗忘之间的两难关系。一方面,个人的记忆对于构建完整的人格和确立个体的伦理身份十分重要,因为“人靠记忆建立了意识,而意识的完整性就是靠持续记忆保有的,人格就是一连串意识的保有”^{[19](16)}。一个人只有依靠记忆建立了对过去的意识,才能够在纵向层面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相连接,从而确立完整的人格。同样,在记忆的帮助下,个体才能在横向层面重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进而确立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伦理身份。然而,在找寻记忆的过程中,随着真相的一步步揭开,摆在埃克索夫妇面前的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是否要恢复记忆,尤其是那些痛苦的记忆。在尼采看来,痛苦的记忆往往是最不容易被遗忘的,这也从侧面印

证了为什么生活在迷雾笼罩下的埃克索夫妇会不时受到痛苦记忆的侵袭,埃克索曾经参与屠杀撒克逊人的不光彩经历会不断闪现。面对记忆与遗忘的两难时,尼采在对记忆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创见性地提出了新型的遗忘,并区分了“群盲的遗忘”和“末人的遗忘”^{[19](23)}。所谓“群盲的遗忘”指的是一种消极的遗忘,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和欺骗自我,这种遗忘一方面源于自我的遮蔽和陶醉,另一方面源于外在引力的指引。“末人的遗忘”既是由于话语遭到剥夺,从而导致在对待历史时演变为欺骗和粉饰,也是一种由现代工业社会快速的节奏所导致的对于人的本真状态的遮蔽。小说中埃克索夫妇的遗忘就是这两种遗忘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迷雾导致夫妇二人失去对彼此的记忆;另一方面,痛苦的记忆使得他们选择逃避性的遗忘。尼采提出的新型的遗忘是一种积极的遗忘,它涉及四个层面:对自身的遗忘、对时间的克服、对他者的遗忘和对言语的超越^{[19](48)}。遗忘的结果之一就是能够将个体从记忆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获得生命的快乐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的新型遗忘与上述弗洛伊德提倡的哀悼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它不是对过往记忆的完全抛弃和忘却,而是一种对于历史延续感的刻意打破,属于尼采所说的“非历史感”^{[20](140)}。它主张人们应该主动向痛苦的记忆告别,带着对于自我的反思开始新的生活。此种遗忘使得记忆与遗忘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被超越,需要对二者的关系重新界定。同样的实践也适用于处理战争或屠杀记忆。

石黑一雄对集体记忆的隐喻书写正是从这一角度展开。在亚瑟王的命令下,人们忘却了不列颠对撒克逊的民族屠杀。这种遗忘对应尼采在“末人的遗忘”中所指出的由于话语被剥夺所带来的遗忘,它尤其表现在对历史记忆的抹杀和掩盖中。在这种遗忘中,过去本身遭到遮蔽和掩盖,留下的只有一些被粉饰的事实,就像小说中的修道院,作为曾经撒克逊民族寻求庇护的要塞,不列颠人正是在这个地方对撒克逊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如今却成为仁爱与和平的象征。然而,遗忘和表面的和平对事实的掩盖只是暂时的,恐怖的过往仍旧在“泥土中蛰伏,像死者的白骨一样,等着人们发掘”^{[6](294)},而且随处可见的“记忆之场”^②会不断地将历史的记忆召唤回来,形成对遗忘的不断干扰。例如,修道院里随处可见的杀戮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曾在这里发生的屠杀事件,僧侣们围绕让野鸟啄食身体的做法而产生的争论也在威胁着遗忘所带来的和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武士维斯坦为首的撒克逊人坚持要求屠杀母龙,以驱散迷雾恢复民族的屠杀记忆,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已逝的同胞复仇,“我

的国王派我来杀死这条母龙, 不仅是为了纪念很久以前被屠杀的同胞。你开始明白了, 先生, 这条龙一死, 就为即将到来的征服铺平了道路。”^{[6](305)}这种固守过去仇恨的记忆只会让被掩埋的“巨人”复活, 从而引发新的血腥暴力, 成为影响民族向前发展的负资产。

在接受石黑千贺子的采访时, 提及《巨人》的创作契机, 石黑一雄谈到了冷战后南斯拉夫爆发的战争和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族伊斯兰教徒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对他的启发。可见, 在石黑一雄看来, 由于军事胜利而暂时遗忘所维持的表面和平不仅不能掩盖双方的仇恨, 而且会使得这种仇恨加深进而引发更大的暴力。石黑一雄正是通过对这种两难局面的隐喻书写, 来激发读者思考该如何处理记忆与遗忘的矛盾关系。与个体主动的遗忘相似, 对于集体屠杀的记忆也需要适当的遗忘才能够避免新的冲突和暴力, 只不过这种遗忘是建立在对罪行的宽恕的基础之上。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The Ethics of Memory*, 2002)中对罪恶如何才能被原谅或遗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遮盖(covering-up)和清除(blotting-out)^{[21](189)}。前者指在不忘记的前提下搁置双方的仇恨, 受害者一方也愿意宽恕施害者而不再寻求复仇; 而后者则指对罪行的彻底忘记。阿维夏·玛格丽特所肯定的就是遮盖模式, 因为这种模式不仅在概念上、心理上以及伦理上都胜过清除模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种模式成功地超越了记忆与遗忘的二元对立, 建立了一种遗忘基础上的记忆。这种遗忘建立在主动宽恕和原谅的基础上, 但是这种宽恕与原谅又迥异于特赦(amnesty), 因为特赦本质上也是一种对记忆的滥用^{[11](605)}, 它往往表现为作为受害者的一方在官方的操纵下以遗忘换取暂时的和平, 其本质与《巨人》中由亚瑟王施加在两个民族间的遗忘相同。

四、结语

诚如石黑一雄所言,《巨人》不仅书写了个体层面的记忆, 尤其是夫妻间爱的记忆, 也写了社会或集体记忆。但归根结底, 记忆只是看待事物的一个透视镜^{[7](109)}, 作者透过记忆和遗忘这对复杂命题, 审视的是个体与集体在不同语境下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实践及其中潜藏的危险, 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超越二者简单对立的可能。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张力源于其与历史、创伤和宽恕等命题的交错关系。伴随着冷战结束后的局部冲突和世界范围内所遭受的恐怖袭击, 记忆与遗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尤其是在新

历史主义和创伤理论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思想家对暴力发生后个人如何走出阴霾、重启新的生活、社会如何对待集体的创伤记忆、屠杀的记忆能否再现以及如何再现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书写。石黑一雄在《巨人》中对个体和集体记忆的书写回应了这一历史趋势, 通过展现个体和集体层面记忆与遗忘的两难, 即个体如何面对创伤的记忆、与自我达成和解以及集体如何走出屠杀和仇恨的阴霾。石黑一雄旨在探询构建遗忘基础上记忆的可能, 从而引发读者重新思考这对看似二元对立实则统一的命题。

注释:

- ① 小说中比阿特丽丝(Beatrice)之名与但丁《神曲·天堂篇》中旅人但丁的向导比阿特丽丝(Beatrice)之名相同, 周小进在其小说译本中, 将之译为比特丽丝。但本文为了强调埃克索在妻子比阿特丽丝陪同下认识记忆与遗忘的过程犹如但丁从地狱到天堂的游历过程, 最终都指向一种更高境界的象征意义, 故选择与但丁的“比阿特丽丝”相同的译法。
- ② 记忆之场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著作《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提出的概念, 主要是指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 时刻召唤着记忆的出现。

参考文献:

- [1] ISHIGURO, KAZUO. The persistence and impermanence of memory in *The Buried Giant* [EB/OL]. (2015-02-28) [2017-07-14]. <https://www.npr.org/2015/02/28/389530345/the-persistence-and-impermanence-of-memory-in-The-Buried-Giant>.
- [2] HOLLAND TOM. *The Buried Giant* review: Kazuo Ishiguro ventures into tolkien territory [EB/OL]. (2015-03-04) [2019-06-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mar/04/The-Buried-Giant-review-Kazuo-Ishiguro-Tolkien-Britain-mythical-past>.
- [3] BATTERSBY, EILEEN. *The Buried Giant* review: Kazuo Ishiguro could use some ogres [EB/OL]. (2015-02-28) [2019-06-05]. <https://www.irishtimes.com/culture/books/The-Buried-Giant-review-Kazuo-Ishiguro-could-use-some-ogres-1.2119977>.
- [4] HODSON, RICHARD J. The ogres and the critics: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 and *The Battle Line of Fantasy*[J].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6(2): 45-66.
- [5] 朴玉. 多重记忆书写——论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4): 87-96.
- PIAO Yu. Memory writing in Joseph O'Neill's *Netherland*[J].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012(4): 87-96.
- [6] 石黑一雄. 被掩埋的巨人[M]. 周小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8.
- ISHIGURO K. *The buried giant*[M]. Trans. Zhou Xiaoji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7] 石黑千贺子. 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J]. 陈婷婷, 译.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7(1): 105-112.
CHIKAKO I. How to face “the buried giant”: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J]. Trans. Chen Tingting.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17(1): 105-112.
- [8]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M].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8: 24.
- [9] 黄旺. 论作为记忆和希望的生活世界——基于利科对记忆、遗忘和想象的沉思[J]. 哲学分析, 2015(3): 4-16.
HUANG Wang. Life-world as memory and hope: On the basis of Ricoeur's meditation of memory forgetting and imagination[J]. Philosophical Analysis, 2015(3): 4-16.
- [10] TEO, YUGIN. 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5.
- [11] 保罗·利科. 记忆, 历史, 遗忘[M]. 李彦岑, 陈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558.
RICOEUR P.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M]. Trans. Li Yancen, Chen Y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2] 何磊. 西方文论关键词: 忧郁[J]. 外国文学, 2017(1): 81-90.
HE Lei. Melancholia: Key words in western critical theory[J]. Foreign Literature, 2017(1): 81-90.
- [13] 沈安妮. 反对蓄意的象征——论《埋葬的巨人》的中性写实[J]. 外国文学, 2015(6): 75-81.
SHEN Anni. The neutral realism in *The Buried Giant*[J]. Foreign Literature, 2015(6): 75-81.
- [14] 邓颖玲. 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遗忘叙事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1): 1-7.
DENG Yingling. A study on the theme of forgetting in Kazuo Ishiguro's newly-published novel *The Buried Giant*[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8(1): 1-7.
- [15] 陈婷婷. 大屠杀与记忆的政治——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中的隐喻解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1): 22-29.
CHEN Tingting. Holocaust and the politic of mem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aphor in Kazuo Ishiguro's *The Buried Giant*[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8(1): 22-29.
- [16] 阿莱达·阿斯曼. 记忆还是遗忘: 如何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 [J]. 王小米,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6(6): 27-37.
ASSMANN A.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way out of a shared history of violence [J]. Trans. Wang Xiaomi.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16, 6: 27-37.
- [17] PLATO. Meno and other dialogues[M]. Trans. Robin Waterfield. Oxford: Oxford UP, 2005: 114.
- [18]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仕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08.
AUGUSTINE. Confessions[M]. Trans. Zhou Shili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6.
- [19] 安晓东. 尼采遗忘观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5: 16.
AN Xiaodong. A study of Nietzsche's view of forgetting[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5.
- [20] 尼采. 不合时宜的沉思[M]. 李秋零,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40.
NIETZSCHE. Untimely meditation[M]. Trans. Li Qiul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1]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M].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2: 189.

On Kazuo Ishiguro's memory writing in *The Buried Giant*

WU Lingying, GUO 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latest novel *The Buried Giant* (2015) innovatively writes the collective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on the basis of his exploration in his previous works into how individuals deal with painful memories. Firstly, the writing of the individual memory in the novel is paradoxical. Ishiguro, by employing the multiple selective omniscience, writes the ambivalent attitudes of the Axl couple toward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emory.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Ishiguro, through the collective holocaust memory between Britain and Saxon, metaphorically writes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a new round of violence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as a result of the appropri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by political discourse. Through his writing of memory, including how an individual, who suffers from the traumatic memory, reconciles with himself and how the two parties in the war find a way out of their history of violence by facing up to the collective holocaust memory, Ishiguro discloses the dilemma of whether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aims to evoke readers to ponder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memory based on forgetting by transcending their binary opposition.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The Buried Giant*; memory writing; remembering; forgetting

[编辑: 胡兴华]